

论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与本质性写作

赵奎英

摘要 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表现在他的“异位”和“异位拓扑学”的思想之中,而且表现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对线性历史话语的解构,其“词物分裂论”对“可见物”的彰显与突出。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促进了视觉文化和空间政治的兴起,而且引发了一种空间化的、对事物本身做出“本质描述”的话语或写作方式的革命。这种回归事物本身的本质化写作倾向与解构主义的游戏化写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历史写作、文学创作、文学文化批评无不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空间化转向 本质性写作 异位拓扑学

一、“考古学”和“谱系学” 对线性历史话语的解构

福柯在有关“权力的地理学”的访谈中曾经说,在西方的历史中存在着对空间的“一贯的贬损的态度”。“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对于那些把历史与旧式的进化、生存的连续性、有机发展、意识的进步或者说存在的规划混为一谈的人,对于空间术语的使用似乎具有一种反历史的味道。如果我们用空间的术语来谈论历史,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时间充满敌意”。福柯同时还谈到,“人们常指责我迷恋于空间的概念,我确实对它们很迷恋。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些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并且在访谈结束处坦称:“地理学为我以往所叙述的一系列事实提供了支持和可能。”“看来地理学确实必须成为我所关心的课题的核心。”^①

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为何会如此迷恋地理学空间化术语,为何会把地理学视为他学术关怀的中

心课题?原因在于福柯所关心的历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理性重构了的线性连续的历史话语,而是一种“谱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的“实际的历史”。这种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对被传统历史学家从实际历史中作为“零星时间”蓄意删除掉的“不连续性”、“断裂性”表现出充分的关注。福柯说:“我们将完全可以对传统的思想史做一切我们想做和能做的理论批评,因为传统的思想史,对其自身来说,至少是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同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实然的再分配。”并且指出:“为了构建话语的考古学史”,应该摆脱这样两种根深蒂固的模式:一是言语的线性模式,一是意识流动的线性模式^②。因为在这两种模式之中,不连续的、偶然的、多样的、重叠的事件,会被纳入到一种由某种先

^①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206、212、213页。

^②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2~213、217~218页。

验主体所统摄的同一的、连续的、线性的历史话语和意义秩序之中。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正是要打破历史主义对于先验的历史主体和绝对的历史连续性的预设,要把思维的、认识的、哲学的、文学的历史从线性连续的超验幻想中解脱出来,以断裂、缺口、间断、变化、转换和实证性的话语分析去“分解由历史学家的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以“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①。

福柯对线性连续历史话语的批判,一方面借助他的“知识考古学”,另一方面则借助尼采的“谱系学”。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福柯依然对“谱系学”意义上的“实际的历史”与传统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话语进行了区分,认为这种“谱系学”意义上的实际的历史将“非连续性”引入人们的存在,打乱了通常在事件的突现与连续的必然性之间建立的关系。它既不表现为原初意想的连续形式,也不是某个结论的推导步骤。它总是显现于事件的独特偶然性。在这种实际的历史世界中既无神意也无终极目的,所有的只是偶然性、随机性。而历史学家的历史,则是一种反复引入或设定“超历史”视点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这种形而上学的历史不管历史本身的头绪多么纷杂,不管历史本身的意志多么盲目,也不管历史本身的线索存在着如何的断裂,却总是倾向于以一种神学或理性主义的方法将特殊事件纳入理想的连续性,纳入目的论的进程或自然因果序列,仿佛历史总是按照一种明确的、预设的目的,按照一种逻辑因果关系有序地向前发展,从而最终将时间的多样性编织成自我封闭的整体,给全部的往昔变迁提供一种和谐的、连续的话语形式,并最终把这一切归结于一个先验的、稳定的、具有同一性的人类主体。而福柯借助尼采的“谱系学”正是要解构这种形而上学的、被先验主体掌控着的、线性连续的历史话语,以“谱系学”的“来源”分析而不是“起源”研究,去揭示复杂的、混沌的、非连续性的“实际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福柯曾经说:“每当人们在历史分析中——特别是当分析涉及思想、观念或者知识时——看到非常明显地使用不连续性和差异这类范畴,界限、决裂和转换这类概念,以及序列与界限这类描述时,人们就会抱怨历史被谋杀了。人们就会谴责说这是对历史

的永不失效的权利和整个历史性基础的冒犯。”^②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福柯的确“冒犯”了整个历史性的基础,实现了对历史的“谋杀”。但福柯对历史性基础的“冒犯”并非否定了历史的有效性,而是走向了一种新的“地理历史观”;福柯对历史的“谋杀”也并非真正“取消”了历史话语,而是使历史具有了更为本真、更为浑整的、空间化的话语形式,促使历史话语从传统的线性“时间化”形式向后现代的非线性“空间化”形式的转移。这种历史观和历史话语的空间化转向促使了历史写作方式的革命,也对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文化批评写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异位拓扑学”对“异位”空间的描述

福柯有关“异位”(heterotopias,又译“异托邦”)的思想,是他在1967年的一次建筑学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其他的空间”的演讲中提出来的。只是福柯这篇有关“其他空间”的重要演讲直到1984年才公开发表。在这篇演讲中,福柯针对传统历史主义构建的时间神话,特别突显了空间的作用。福柯指出,“19世纪的一个巨大痴迷是历史”,“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将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和近的、并列的、分散的时代。”并认为:“无论如何,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本质相关,毫无疑问,这种同空间的关系大大基于同时间的关系”^③。

在这篇演讲中,福柯还对西方经验中的空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认为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完整的、稳定的、呈等级体系并且是局域化的“安置的空间”;到了伽利略时代和17世纪,那种局域化的“安置的空间”被一种开放的、呈无限延展的“延伸的空间”代替了,这种延伸的空间是用无限运动来计量、与人的实际存在没有关系的机械物理空间。而“我们时代,空间是以我们在具体场所(sites)中的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场所”是与人的具体生存

①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18页。

②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7页。

③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 *Diacritics*, Spring, 1986
本文有关福柯“他者空间”英文材料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教授泰勒斯·米勒(Tyrus Miller)先生的惠赐,特致谢忱。

实践密切相关的、由各种“关系”界定的“异质性空间”。在由各种关系界定的所有“场所”中,福柯最感兴趣的是“异位”。所谓“异位”,是指那些存在于既定的社会空间中、在功能或性质上与其他(常规)空间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奇异的空间。用福柯的话说,这种空间“在与所有其他场所的关系上具有令人好奇的性质”。这种空间与常规空间不同,但又与通常的文化空间相关。各种各样的与通常空间不同且相关的场所,诸如墓地与教堂、戏院与花园、博物馆与图书馆、集市与度假村、兵营与监狱、妓院与殖民地等,形式各异、彼此不同,互不重叠、纷然杂陈,组合在同一个“真实的地方”,这便是福柯称之为“异位”的空间^①。“异位”指向了社会生活空间的复杂性。“异位”的空间不代表生活空间的完美形式,它可能完美也可能不完美;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幻想”,而有可能是一种“补偿”;它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把它与以完美的形式或以颠倒的形式来呈现社会的“并不真实存在”的“乌托邦”进行比较。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国内一些学者也将“heterotopias”一词译为与“乌托邦”(utopia)相对的“异托邦”。

为了尝试对“异位”进行一种系统描述,并充分彰显“异位”这一概念的意义,在这篇演讲中,福柯还提出了“异位拓扑学”(heterotopology)的思想。“异位拓扑学”不是对空间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有关同时性的神话、有关我们生存空间的论辩和对异位空间的描述。在这里,福柯概括出了“异位拓扑学”对“异位”进行描述的“六项原则”。综合福柯“异位拓扑学”的描述以及苏贾(E. W. Soja)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福柯的“异位”不是几何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的、连续的、同质的空间,也不是常规的社会文化空间或纯粹的心理空间,而是属于苏贾所说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福柯之所以关注“异位”这种“第三空间”,一方面在于“异位”偏离常规的异质性、他者性所具有的挑战一切现成规范和既定秩序的激进政治文化意味,另一方面或许由于这种奇异的非常规空间在通常的空间科学研究中更缺少自己的声音或话语,而它在人们的当代生活中又实际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与常规空间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使得如果不对这种“异位”进行描述分析,实际上就难以真正揭示出更加复杂浑

整的真实空间位所关系。因此,福柯的“异位拓扑学”对实际存在的“异位”的分析描述,就像其“考古学”和“谱系学”对实际存在的“历史”的分析描述一样,力图呈现出那种异质的、他者的、不统一、不完美的“实际的空间”的本来面目。

这种与人们的实际生存实践密切相关的“实际的空间”,打破了形而上学对于虚幻的、抽象的、连续空间的幻想,他告诉人们,各种不协调、不相称的空间场址是同时并存于同一个世界之中的,而我们今天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异位拓扑学”对“异位”空间的描述,不仅“对后现代条件下政治反抗的可能性提出自己的解释”^②,也对人类的思维和生存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试图提醒人们,在当今世界中,不仅要注意诸如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这样的时间问题,而且还应注意当今时代生存的空间并存关系;不仅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常规生存空间,而且应注意在常规生存空间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异质的生存空间,从而促使人们从线性的、同质的时间化思维向异质的、同时并存的空间化思维的转向。福柯这种由“异位拓扑学”开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促生了后现代的空间政治文化,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后现代哲学、文学与批评对于实际空间的书写方式。而要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把福柯对于空间、历史的思考与他的整体学术思路、与他“话语对象”不同于“事实对象”、“陈述物”不同于“可见物”的“词物分裂论”联系在一起。

三、“词物分裂论”对“可见物”的突出

语词与事物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西方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词与事物之间存在着自然或天然的对应关系,语言是世界的“摹本”或“图画”,二者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相似性。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其“符号任意性”原则,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促生了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旨在强调语词

^① 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页。

^② 汪行福:《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与事物、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区别、对立与分裂的后现代的“词物分裂论”。福柯本人虽然极力反对被归入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阵营,但福柯的“权力”概念,福柯对历史起源研究的贬抑,无疑都受到索绪尔把语言视作任意性、强制性、共时性“规则”系统的影响;而他在词与物的关系问题上更是坚持一种典型的从索绪尔符号任意性而来的词与物分裂的思想。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知识”实际上也即“话语”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整体构成自己“对象体系”的实践活动。事物、现实并不是形成知识的“原始规律”,话语对象的形成“并不参照事物的基质”。在分析话语本身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词与物从表面看来如此紧密的结合松懈了”^①。“陈述物”不同于“可见物”,“说”不等于“看”,“词”与“物”之间是存在着“分离性”的(德勒兹语)。

福柯的《这不是一只烟斗》曾对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里特的一幅同名绘画进行解读。马格里特的这幅绘画,画面上明明“是一只烟斗”,题词却说“这不是一只烟斗”。福柯指出,马格里特的绘画,通过文字符号与形象画面的相互配合,在“所说物”和“所见物”之间引来了否定关系,切断了语言与事物的“确认性”和“相似性”联系,以一种典型的“图文分离”,宣布了“图形式”(calligram)试图消除“图文对立”的努力的解体^②。福柯对“图”与“文”之间的分解与否定关系的突显,不仅能为当今的图像文化的兴起提供理论支持,而且对于那种切近事物本身的空间化的本质性写作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福柯突显“图”“文”分裂的目的,旨在表现作为“可见物”的“图”而不是作为语词的“文”,是要突显“图”对“文”的专制的反抗,突显空间化、视觉化的“图”中那些无法被线性化、时间化的语词之“文”。这与他更加重视“物”的领域的“考古学”旨趣完全一致,这也是他与德里达的根本分歧之处。

德里达也是坚持一种“词物分裂论”的。但同是强调词与物之间的分裂,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并且人们完全可以由此走向不同的道路。因为在认识到“语词”与“事物”的必然分裂之后,人们既可以抛弃对终极自然之“物”的幻想,由此走向与“物”分裂的、空洞的、无序的“语言”,走向词语追逐着词语、语言追逐着语言的写作游戏;也可以揭示出隐藏在任何一种话语背后的权力规则,放弃对自然

的、无偏见的线性“话语”的幻想,由此走向无法被语言真正表象的、沉默的、混沌的“物”的领域。如果说前者是德里达的选择,后者则主要是福柯的思路。福柯对疯癫史的研究,对性史的研究,对监狱的研究等,无不表现出后一种倾向。他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在这种语言中,疯癫本身却是沉默的。“我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③。但“物”要想被认识,沉默的东西要开口说话,它无法最终摆脱语言化,它还是要成为“话语”。福柯这一返归事物本身的现象学倾向遭到了德里达的致命攻击。之后,福柯虽然在研究取向上有所调整,力图把自己的研究保持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中,但福柯思想的深沉脉搏一直在那个沉默的、混沌的、实际存在的“物”的领域涌动,福柯思想的目标和魅力正在于力图让那沉默的东西开口说话,力图把那些冥暗、混沌之物开启到“可见”的“光”中。由于实际存在的事物与实际存在的历史、实际存在的空间一样,本身都是一种非线性的“空间化”存在,“事物本身的语言”,或对事物的“本质的描述”,也必然是一种非线性的“空间化话语”,这也正是福柯为什么在历史、知识、权力等的研究中迷恋空间化地理学术语的原因。福柯的空间化转向不仅推动了对空间本身的关注,而且带来了一种写作或话语方式的空间化革命。这种空间化写作返归事物本身的本质化倾向,与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所促生的游戏化写作形成了对比,无论是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历史研究,还是对于文学文化批评来说,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本文作者:赵奎英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时世平

①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58~61页。

② 《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9页。

③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